

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维度研究

赵志义¹, 倪帆²

(1. 浙大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2. 西澳大利亚大学 人文学院, 澳大利亚 珀斯 6009)

[摘要]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时,正值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时期,世界文学自诞生起便与国际贸易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不同语种间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既促成了作品的跨国传播和流通,亦催生了依附于文化产品之上的利益链条。世界文学在文化贸易中,逐步形成了以英美—欧洲文学为“核心”、以亚非拉等地区文学为“边缘”的极度不平等的贸易模式,从而实现了英美—欧洲文学在主导性语言、意识形态及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话语霸权,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同质化”的倾向。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为基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的新体系,从而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局面,为人类的文明建设与世界的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世界文学; 文化贸易; 同质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 I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5-0108-09

19 世纪的欧洲刚刚结束了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浩劫与动荡,急需从战争的对峙与仇视中走出来,因此,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希望为各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并号召当时的每一位文学爱好者努力加速世界文学的早日到来:“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113} 对歌德来说,加速世界文学的“早日来临”出自民族文学间相互交流的强烈愿望,而真正催生“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实践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经济贸易的兴盛带动了文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同时也逐步形成了英美—欧洲为“核心”的话语霸权,从而实现“边缘”地区的控制。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改变,世界文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应积极地寻求发展的新思路。

一、翻译加快了世界文学的“交流”

歌德受到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市场的启发与影响,勾勒出了一个由新经济法则统治的文学

[收稿日期] 2022-04-05

[作者简介] 赵志义(1966—),男,河南开封人,浙大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研究。

倪帆(1994—),女,安徽合肥人,西澳大利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华语生态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世界的轮廓:“一个所有国家携带自己的知识财富来此交换的文学市场,一个普遍的知识贸易市场。”^[2]歌德借用了大量的经济贸易词汇,例如“知识”“财富”“市场”“贸易”“交换”“商品”等,来比喻世界文学的交流、传播等特性。在这里,“财富”及“商品”指来自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学作品;“知识”强调了“商品”的属性,属于精神食粮;“市场”就是民族文学“汇集”与“贸易”的场所,实现文学“商品”的目的与意义,服务于产品的交换及思想的交流。世界文学话语虽然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情怀,但是,也明显带有“经济比喻”的特征:“世界文学为西方与他者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资本的交换、占有与积累提供了场所。”^{[3]216}在歌德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贸易市场的形成,改变了文学的传统特性,加速了世界文学的价值由“使用”向“交换”的转移。文学作品一旦在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被创作出来,就获得了假定的“使用”的属性,但是此种属性只有在文学作品的流通与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从而又获得了“交换”的价值。随着“资本”与“贸易”逐步向文化领域的渗透,无论是物质商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具有明显的“交换性”:“正如资本带来了世界市场赖以存在的商品的总交换能力一样,资本在文学领域也带来了总交换能力。”^{[4]50}在世界经济贸易的市场内,翻译成为贸易双方进行交换的重要媒介,同样,在世界文学场内,翻译也成为最重要的、最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之一,被视为不同国家之间思想交流的关键环节。这充分体现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即世界文学不是书写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的流通中形成的。某种程度上,翻译与“交换性”加快了世界文学的早日到来。

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贸易市场的形成,带动了翻译事业的繁荣;同时,翻译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一体化。资本主义海外市场的拓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翻译的中介作用:“无论人们怎么说翻译工作的不足之处,翻译工作仍然是世界贸易普遍市场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5]而世界文学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文学组成,自然需要翻译组织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强调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世界文学的一个真正特点在于它总是分解成各种各样的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因时代、地区和文化声望而不同……”^[6]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简单地“由世界各地的写作而产生的文学”,而是一种在翻译中受益的写作模式,翻译成为促进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唯一途径。翻译家被视为源语言与目的语言之间的“中间人”,协调文本要求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关系。翻译家的出现,确保了文学的可翻译性,同时也保证了文学的可交换性,因而,翻译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同时又成为一项非常兴隆的事业。

翻译繁荣了世界文学市场。歌德正是通过广泛地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了解到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观点。达姆罗什也十分重视翻译对世界文学传播的促进作用,认为翻译是助力民族文学跨越本民族语言局限的必经环节,进而促进民族文学在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场内进行传播。离开了翻译的中间环节,世界文学就不会产生。一部文学作品在本民族环境中享有极高的文学地位,但是,假如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译本,精确地说,假如没有被翻译成最具有影响力的语种,比如说英语、德语、甚至法语等比较通用的语言,也很难被其他民族所了解,当然也无法跻身世界文学的行列。正是借助于大量东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尤其是借助于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的翻译作品,歌德所接受文学的范围才突破了欧洲大陆的局限,逐步扩展到东方文学、亚洲文学等,语种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等等。歌德认为,一个民族正是因为具有独特性,而非相似性,才能凸显出自己独有的文化价值:“每个国家的独特性就像它的语言和货币一样,使彼此贸易更容易,事实上,它们首先使贸易成为可能。”^{[4]50}正因为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独创

性,德语翻译家才能发挥翻译的传播功能,才能够促使民族文学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流通与普及。

翻译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包容性”“开放性”及“交换性”提供了合理的依据。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翻译又成为一项赚钱的工作。翻译家被歌德视为“生意人(businessman)”——一个在世界文学场内获取利润的经济掮客:“他必须成功地把产品销售给目标读者,同时从这项活动中获得某种(经济的或者象征性的)利益。”^{[3]225} 出版社、贸易商、翻译家等从事世界文学交流的中间环节,往往偏好那些市场畅销的、迎合读者的文学作品,积极开展图书贸易,获取“利润”“盈利”等。这无形中助推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从而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

二、世界文学“核心—边缘”不平等的贸易模式的形成

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或利益,翻译家们首先要选择那些具有庞大的读者群、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图书,因而,那些在市场上“走红”或“畅销”的作品,或迎合大众欣赏口味的通俗类作品成为他们的首选:“翻译作品成功的原因归因于这些小说的题材——浪漫小说、恐怖小说、惊险小说。这类小说迎合了大众的品位,使读者能够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同情式的认同感。”^{[3]209} 歌德阅读的一本德文版的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在题材上就是一部“中国传奇”,一部三流的“才子与佳人”的风流小说,在“中国绝对称不上是最好的作品,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这类作品”^{[1]213}。但是,这部小说讲述的男欢女爱、充满激情的故事,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主题非常相似,容易使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认同感。歌德对中国小说的喜爱体现了他的立场:“中国故事创造了审美幻觉与虚构的人物,得到现代具有理性的欧洲读者的认同。”^[7] 歌德将“同感性的理解”——一种在文学的他者中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作为这部小说的世界性纽带。这本通俗的爱情小说在中国根本称不上文学经典,甚至鲜为人知,却被翻译成德语并贸易到欧洲,与其说是为了文化的交流,不如说是看重了本书潜在的读者市场,能够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异域文化风情的好奇。背后复杂的经济链条为本书的贸易——从遥远的东方(中国的都城北京),到万里之遥的欧洲(德国魏玛)——铺平了道路。这条东西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受利益驱动的经济贸易之路,由翻译、出版、发行、运输等构成了这本书背后的利益链条中的环节,并分享所带来的利润。

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是推动翻译作品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世界文学场内并非个案。历史上,翻译“边缘化”或者说出版商不愿意大量投资翻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其经济价值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其他类别图书的出版,翻译作品在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也就是说,整个生产流程的成本太高,需要提前垫付一大笔开支,用于购买版权,支付翻译、出版、市场运作,甚至国外市场的开发等费用,这样过高的成本很容易增加投资亏本的风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商与翻译家们也开始关注那些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畅销书,也希望借助翻译帮助它们能够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环境中获得同样的成功。翻译作品带动了意大利出版业的繁荣与快速发展:“在过去的六十年内里,意大利每年出版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出版物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3]208} 意大利出版业越来越依赖于翻译作品,尤其是从美国翻译过来的作品,而且数量巨大,充分说明了翻译作品在意大利市场上很具有商业活力,“它们之所以能够迎合大众的口味,这都跟美国文化在20世纪后半叶在意大利所积累起来的象征资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关系”^{[3]209}。意大利出版商为了追求巨额的利润,有意迎合意大利读者对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审美情趣,特选择二战后期那些采取现实主义手法描述美国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精英小说,包括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等人

的作品进行翻译、出版、再版、重印等,这些是“与垮掉的一代相关的文学作品,有的是探究美国边缘社会不按传统规范生活的一些人的生活,有的则属于冷酷的犯罪小说类型”^{[3]209}。这些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受到了意大利读者的欢迎,与意大利传统的文学经典范式所表现的主题极为相似,符合意大利读者的审美情趣:“意大利的文学经典范式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于,他们对一种特殊的浪漫个人主义的偏爱,他们这是坦率的自我表达,他们这是自由自在,不愿受任何社会规范的约束,他们设置可以蔑视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言行举止都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3]210}美国现实主义作品侧重于对现实的关注、对个性的张扬等,易于引起意大利读者的共鸣,产生对作品中人物的同情式的“认同感”(identification)。

事实上,高度“认同感”是畅销小说产生的典型感受,所带来的快感可能是补偿性的。现实中的读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都面临着同样的社会问题,亟待寻找解决的办法,而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的最终圆满结局恰恰提供了虚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使读者从中获得了获胜的快感,也使自己的内心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现实主义作品平铺直叙、句法简单、词义准确,便于读者的直接理解,因而,受到了意大利读者的欢迎。美国现实主义作品在意大利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吸引着出版界的重点投资,这无形中推动了翻译作品在意大利的繁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文化在与其他非英语文化的交流中保持着极大的顺差,文化的输出远远地超过了文化的输入,具体表现在翻译的“不平等”性上。无论是出版商、制造商还是广告公司、跨国公司等尽管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跨国公司与本土消费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8]165}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信息,英语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的作品。1987年,全球的翻译作品的产量接近于65000册,其中,超过32000册来自于英语,占总数的近50%,而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语言的仅有800余册,仅仅占1.2%,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巨大的。这种不平等的翻译成果导致了英美国家出版业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明显的贸易顺差:“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是被译出最多的一种语言……同时,又是被译入最少的语言。”^{[8]160}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欧美国家赚取了大量的金钱,仅英语语言书籍的版权销售就非常赚钱,每年为出版商带来了数亿美元的盈利:“从翻译英语作品中赚取了大把的钱,但很少投资把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自1980年代,英语作品的海外版权的销售非常赚钱,每年为出版商们来了丰厚的利润。”^{[8]160-161}来自于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等地区的非英语作品因为需求量有限很难引起出版商的兴趣,因而,在世界文学场内,翻译的不平等的生产模式,维持着一种极度不对等的文学贸易。

三、世界文学场内英美文化的同质化

世界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脱离了最初的宗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贸易或交流并没有“平等”,而是严重地“不平等”,形成了“核心—边缘”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为“核心”的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顺差,而且还实现了对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弗朗哥·莫莱蒂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世界文学猜想》中,在已经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基础之上,提出了世界文学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具体表现为:“有一个核心和一个边缘(以及一个亚边缘),它们被捆束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关系中。”^{[3]125}莫莱蒂根据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揭示了世界文学的布局,即文学受经济的驱动,形成了此种不均衡的格局。这里的“核心”就是西欧与北美地区,处于关键的主导地

位;“边缘”指的是亚洲与非洲地区,“亚边缘”指的是拉丁美洲与东欧地区,二者处于被排挤、受支配的地位。在“核心”的视野中,“边缘”地区的人民被称为“他者(Other)”,依据黑格尔的定义,是指主导性的主体之外存在着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性才得以确立。因此,西方才能够确立自己的优越性:“……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等能力的结果。”^{[9]22}相对而言,“核心”的世界文学格局决定了与“边缘”之间的文化贸易是一种不平等交换模式,对后者一直保持着绝对的顺差与控制。

最初,世界文学主导性的语言有来自欧洲的法语、德语等,无形中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核心与标准,决定了世界文学的思想内涵与概念性框架等都以欧洲文学作为参照对象:“当然,比较文学真正的意思,首先是,要有很好的法语和德语口音,这是进入的代价。……但口音确实成为优秀的标志,也是一种保障。”^[10]歌德强烈推崇德语为世界文学的“通用语言”,认为德语特别适合扮演世界文学的“调解人”(mediator)或“中转站”的角色。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首先需要翻译成德语才能进入世界文学场内,这无形中强调了德国文化、语言和文学在协调各国文学中起到的“过滤”作用。同时,德国文学经过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希望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产生更深刻的文化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加权威的话语权。

18世纪,英国通过“七年战争”击败了法国,最终建立了“日不落”帝国。19世纪,英语逐步取代法语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通用语言。英语的“全球化”最终会将作为西方霸权主义代表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直接影响与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或同质性(homogenization)。英语世界文学最权威的作品选集《诺顿世界文学文集》《朗文世界文学文集》及《贝德福德世界文学文集》等,都是用英语编辑而成的,其中主编、编辑几乎全都由来自美国或英国的学者担任,是英美文化的代表。这意味着,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要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员,必须经过翻译的“过滤”,必须符合这些编辑们的“口味”:“即使在今天,外国作品在美国也几乎不会被翻译,更不会被广泛传播,除非它们反映了美国人的关切,符合美国人眼中的外国文化标准。”^[11]就民族文学的变化过程,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椭圆折射”的理论:在世界文学内,民族文学在其他的文化中流通时,获得了双重的特质,既保留了标志着它们民族身份与起源的部分特征,同时在接受文化中获得了其他的特质。达姆罗什试图科学地解释民族文学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内传播时并没有丢失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反而因吸收其他不同的文化元素而变得强大。然而,这也无形中承认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内必须经过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价值取向及意识形态立场的“过滤”。这些“过滤”首先必须经过翻译成英语,必须能够带来巨额的销售利润,必须符合特定的“价值标准”。经过这样的“过滤”后,民族文学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折射”,会部分地失去自己“原汁原味”的特性,会增加更多的英语文化,趋同性会越来越明显。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一种富有创造性或想象力的写作,这种写作必须符合上流社会文学的某种标准。换句话说,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体现上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那些体现了特定社会阶层的价值与品味的作品才算是文学,而街头民谣、通俗小说,甚至戏剧都不是。因此,在这一历史时刻,文学概念的价值负荷应当是不证自明的。”^[12]传统的经典作家及作品除了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还充当了“欧洲中心论”的杰出代表:“威廉·莎士比亚、约翰·弥尔顿、马修·阿诺德等作家被广泛经典化,除了他们的文学审美价值外,还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在欧洲中心论与种族主义的文学经典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13]这样的文学传统自歌

德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愈演愈烈。托马斯·麦考莱——维多利亚时期一位傲慢的保守党议员、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了用英国文学对印度殖民地的青年进行改造与再教育,他的依据就是英国文学在本质上优于“东方”文学:“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人会否认,欧洲图书馆的一架图书的价值完全等同于印度与阿拉伯本土文学的全部价值。西方文学固有的优越性,确实得到那些支持东方教育计划的委员们充分认可。”^[14]本质上,此类“强势”文化不断地向“弱势”文化的大举入侵和深层次渗透,就是“核心”对“边缘”的文化入侵,从而实现对“边缘”的控制与“同化”。

所谓的“核心”通过不平等的文学贸易,带着“帝国主义的眼光”,将“欧洲文化至上”的观念传播到“边缘”地区,即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是如何把欧洲影响散布到世界各地、从而将迥然不同的文化拉近。”^{[9]22}不平等的文学贸易不是协助世界各地一起发展,而是试图将整个世界上纳入到所谓的“核心”的“轨道”内,实行殖民统治:“确实,按照全球化的法则,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总是希望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便一度将全球化当作实行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的一把利器,试图用全球化的力量来削弱主权国家的地位。”^[15]文学的普及、文化的入侵,使得越来越多的“边缘化地区”进入到“核心”文化的阵营中,共同享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贸易的不平等对“边缘化”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产生了“西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英美畅销书因具有完善的营销策略,通常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发行量也很大,对于“边缘化”国家来说,英美文学比本民族的文学著作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因此,这种经济上的“强势”无形中会“挤压”图书投资的空间,极大地抑制了本国的语言、文学及读者的发展。大量的翻译畅销书进入到“边缘化”国家,新颖的文化对本国年轻的读者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尤其在年轻的读者中培植了强烈的西方意识:“翻译作品帮助盎格鲁—美利坚的价值培养精英的西方化的读者群体,从而使他们不再关注本国的文化。”^{[8]163}此种不平等的贸易易于在本国精英分子中培养“西化”意识,使他们更加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从而改变传统的文化构成,逐步取代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这种同质化的进程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愈加明显,教育与文学作品为人们打开了获取国际背景知识的通道:“语言的标准化及对过去和现代文化史上的文学巨匠的普遍熟识——从莎士比亚、波普和约翰逊到狄更斯和斯科特、沃兹沃斯……这一切所谓文化上的统一使得完成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统一成为可能。”^[16]因此,“相似性”会逐步取代“独特性”,“趋同”现象越来越明显。“世界文学”时刻提醒着我们,“世界文学”与“欧洲中心论”以及全球资本存在着潜在的共谋关系。

四、中国特色世界文学体系建构的新思路

东西方文学之间不平等的贸易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英语文化的同质化,已经不适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因而,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文学理念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随着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崛起,需要重新调整世界经济体系,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或者我们过去所说的“西方世界”到亚洲等地区重大地缘政治的调整。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单一的、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视野,更加关注迅速变化的、发生在“传说中的”远东地区带给世界文学的巨大变化,特别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成功实施,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创建新的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历史上,歌德借助一部中国小说来表达自己的世界文学思想,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与欧洲文学的

平等关系。然而,在歌德去世后的150年内,逐步形成了欧洲文学对“非欧洲文学”的“傲慢”,违背了世界文学“平等”的基本观念。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将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打破:“世纪之交,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更加公平的尝试,即在一个快速变化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7]在过去的几十年内,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开始出现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随之带来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问题的转变、英语—中文之间翻译与贸易模式的打破等。这意味着欧美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相对减弱,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开始思考世界文学的内涵变化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仅仅讨论如何创建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的“英语适应性”,更要思考在世界文学场内的“中文主导性”:“从现在起,法国理论是否必须通过中文翻译而不是美国翻译才能到达世界?中国的文学理论及古典批评理论,比如《文心雕龙》是否引导世界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的世界文学文集是否能够取代美国文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集?”^[7]这就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理念为指导,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为文集的编纂、价值的评判以及排名提供更合理、更科学的标准。

“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的编纂标准为“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17]。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给出的明确答案,也同样成为世界文学的新标准。习总书记推荐的文学经典范围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文化最优秀的作家及最精华的传世之作。这里的“优秀”在于流传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但更重要的是“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17]。

“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之一就是“多元与平等”,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在2017年1月18日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特征:“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18]544}不同的文明平等相处,更需要“和而不同”:“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18]524}“多元与平等”是世界文学建构的基础,尽管各民族文学彼此相异,因为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体现出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用不同的民族语言书写而成等;但是,又因为具有共同的愿望凝聚在一起,形成“和而不同”:“我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应该简单地了解彼此。”^{[4]50}正因为差异的存在,各民族之间的文学才能相互交流与借鉴,获得发展的新动力:“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8]525}这种“平等多元”的文学理念涵盖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最优秀的,尤其是来自“边缘”地区的文学,从而打破“欧洲中心论”一直独霸世界文学的局面,拓展并完善世界文学研究的维度。

“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之二则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非常重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8]543}。在世界文学场内,各民族兜售自己的知识产品,开展思想的自由交易等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们彼此间的思想交流:“只有借助文学,人类才能超越地理、政治和语言的界限与区分;文学最终将在世界各国的集体精神上发挥其全部变革力量,汇聚各国共同愿望,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联邦与国家民族认同感。”^[19]各民族文学需要互学、互鉴,

做到“美人之美”,进而实现“美美与共”,即交融、整合、创新。凝聚各民族文学的内在机制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愿望,即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调和不同文化与民族间的分歧与冲突,维持世界的和平:“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8]544}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构建世界文学体系的动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世界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功能,从而丰富并完善世界文学独有的文化内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世界的人类依然面临误解、冲突、暴力甚至战争等威胁,需要各民族团结起来,协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最终的和平共处。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最有效的、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能够加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消除误解与分歧:“文学最终可以说在发起和构想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互动、促进文化外交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与永久的作用。它真正地培养对多样性的容忍,并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一种共融而非对立的政治、种族、性别与社会意识。”^[19]世界文学克服了性别、阶级、文化、语言、种族等设置的局限性,实现了相互之间的共融,从而解构了任何奉行政治、种族与族裔党派关系的霸权体系,或社会党派提倡的排他性与专权主义,服务于人类永恒的人文主义与和平思想。

五、结 语

长久以来,众多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都期望文学研究能够破除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论,寻求世界文学秩序上的变革。他们积极选择、翻译及介绍能够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外国优秀作品,坚持作品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强调对世界人民的情感陶冶、精神温润与道德教化等独特的审美价值,传播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与名族文化传统,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体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寻找与构建真诚而贴切地表达世界人民希望与期盼的话语,并让这种话语表达与世界人民的希望和期盼相契合,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2] Strich F.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9:5.
- [3] 达姆罗什.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M]. 刘洪涛,尹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 Martin P. Poetry of the revolution: Marx, Manifestos, and the Avant-Garde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Casanova P.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Translated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3.
- [6]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3(APRIL-JUNE):9-14.
- [7] Theo D. Re-Orient?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019:3(2):113-127.
- [8] Lawrence V.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9] 博埃默. 殖民与殖民文学[M].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0] Spivak G C, Damrosch D.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1,48(4):456.
- [11]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8.
- [12] Eagleton T.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8:15.

- [13] Javidshad M. Analysis of canonical works in two versions of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J]. *Literary Criticism*, 2018, 40(10), 167—184.
- [14] Macaulay T B. Minute on education (1835). [EB/OL] (2005—06—30) [2020—9—10] 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c/pritchett/00generallinks/macaulay/txt_minute_education_1835.html.
- [15] 王宁. 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及翻译研究: 定义、功能及未来走向[J]. *外语教学*, 2016, 37(03): 89.
- [16] 沃特森 C. 多元文化主义[M]. 叶兴艺, 译.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94.
- [17]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研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 *中国乡镇企业*, 2009(07): 4—41.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9] Amirhossein N, Ali H D. World Literature: A panacea for the colonial prejudice of english Literature[J]. *Ka@ta*, 2020, 22(1): 5, 1—9.

(责任编辑: 程晓芝)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in its Development

ZHAO Zhi-yi¹, NI Fa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2. School of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Australia 6009)

Abstract: When Goethe coined the term “world literature” (Weltliteratu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global capitalist market was taking its form. And world literature wa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e order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is article scrutiniz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works did not just enable its circulation, but also became the profit chain attached to these 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an unequal trade system has been formed: whereas Anglo-American (and major European-language) literature is at the absolute center, with that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s “the marginal.” Thus, the modern Euro-American language and ideology has become the normalcy and exerted a hegemonic power in the global cultural sphe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hould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configuring a contemporary paradigm of world literature, where literary works from non-Western languages should play a larger role and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orld peace.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cultural trade; homogeniza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paradigm